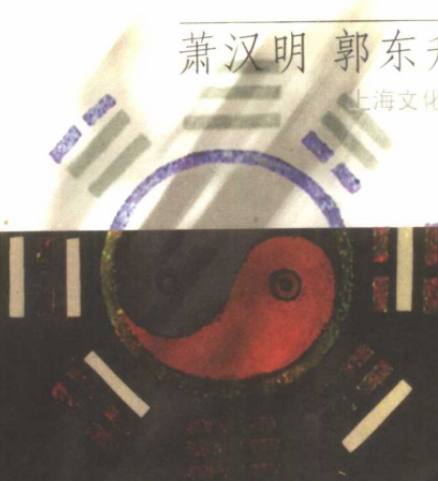


《周易参同契》

研究

萧汉明 郭东升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道家文化研究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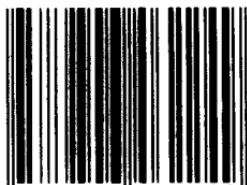


道家文化研究丛书

上海文化出版社
萧汉明 郭东升 著

《周易参同契》研究

ISBN 7-80646-224-4



9 787806 462249 >

定价：20.00 元

道家文化研究丛书
主编 汤一介 陈鼓应

《周易参同契》

研究

萧汉明 郭东升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易参同契》研究/萧汉明,郭东升著.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1.1

(道家文化研究丛书)

ISBN 7-80646-224-4

I.周… II.①萧…②郭… III.周易参同契-著作研究 IV.B2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39083号

责任编辑:李国强

封面设计:官超

《周易参同契》研究

萧汉明 郭东升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 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总 经 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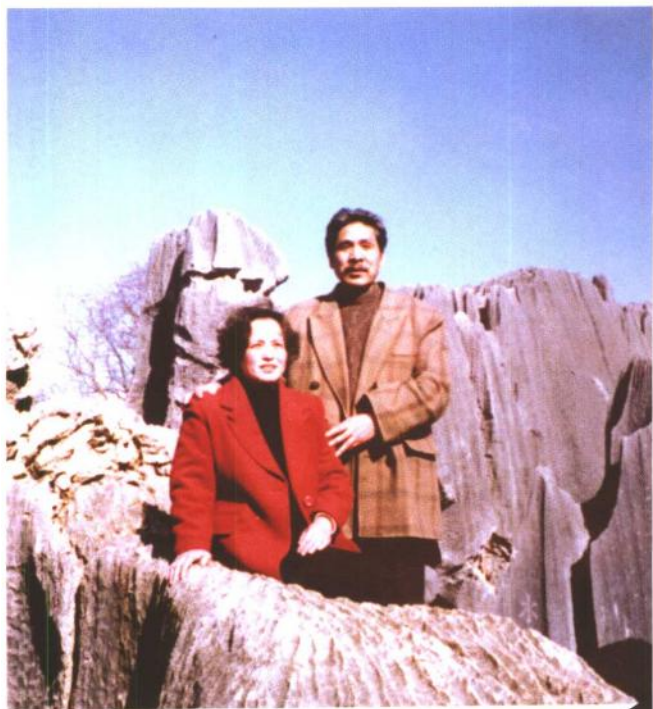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25 插页 3 字数 218,000

2001年1月第1版 200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100册

ISBN 7-80646-224-4/B·43

定价:20.00元



作者萧汉明郭东升
夫妇1998年2月在
云南石林

夫子有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此其学之境界，有递进之别，然别中似有不别存焉。非好之焉，则虽啜酸果坐冷板凳而成其知识，非乐之焉，则虽忘声色轻货财而成其喜好之癖。是以凡真有其知者，必有好之、乐之存乎其间矣。

▲ 作者萧汉明手迹

《周易参同契》
研究
家
文
化
研
究
丛
书

“道家文化研究丛书”

总序

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一样对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有巨大影响,并且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德国哲学家雅斯伯思(Karl Jaspers, 1883—1969)曾提出“轴心时代”的观念,他认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在古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对人类关切的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中国有老子、孔子,印度有释迦牟尼,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这些文化经过两三千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的主要精神传统,而且这些不同地域的不同文化,原来都是独立发展出来的,并没有互相影响,只是在后来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才产生了相互之间的影响。这说明老子开创的道家不仅是中国人的精神财富,而且也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

本世纪八十年代,在国内外对儒家学说的研究比较兴盛,相比之下道家思想的研究不像儒家思想的研究那么红火。但进入九十年代,国内外学术界对道家思想的研究开始重视起来。在国内不仅出版了不定期的丛刊《道家文化研究》,而且召开过多次国际性的“道家文化”的学术讨论会,还出版了一些颇有学术价值的专著,推动了道家文化的研究向纵深发展。

总观历史,我们可以说,儒道两家在思想上形成的某种互补格局(当然后来又有佛教的加入,形成了儒、道、释三家在中国历史上合流互动的局面),一直影响着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果说儒家思想的特点表现为一种人文主义精神,那么道家思想的特点则表现为一种自然主义的倾向。儒家大体上是从追求个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而发展为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即人类社会的和谐),例如儒家所提倡的“和为贵”、“致中和”等思想就表现了对人与人之间和谐的追求。道家则是从体认自然的和谐引申出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例如老子所说的“道法自然”和庄子所说的“太和万物”的思想,都表现了道家“崇尚自然”的特质。因此,对道家思想和对儒家思想的深入研究都是我们应特别重视的。从目前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最重大课题看,大家都承认是“和平与发展”问题。人类社会要合理健康地发展就必须“和平共处”,因此就要调整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体地说就是要调整好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儒家思想可以为当今人类社会提供有意义的资源。但今日之世界不仅需要较好的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要考虑较好地解决人与自然的(自然环境的保护问题),人类社会才可以“共同发展”,在这方面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无疑可以提供有积极意义的资源。因此,推动道家思想的研究是很有现实的和理论的意义。至于道家思想在哲学形而上理论层面的贡献,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宝库,而且也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精神财富。今天我们研究道家哲学理论需要以现代眼光给它以新的诠释,使之日日新,贡献于世界。

道教是中国本民族的宗教,它和道家(老庄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可以说道教在思想文化上是道家思想宗教化的继承和发挥。道教作为一种宗教不仅对民间有着巨大影响,而且它对中国哲学以及文化的各个方面(例如文学、艺术、医药卫生等等)都有重要影响。查《道藏》中收入了对《道德真经》(《老子》)的注释五十余种,对《南华真经》(《庄子》)的注释十余种,这些注释都是在不同时期、不同历史条件下对老庄思想的大都发挥。如果我们说,先秦老庄是道家思想的第一期,即创始期;那么魏晋时期的“玄学”则可以被视为道家思想的第二期发展,例如王弼的《老子注》、郭象的《庄子注》都是对老庄思想的新的解释,并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到唐初兴起的“重玄学”,我们可以把它视为道家思想的第三期发展。道家思想的第三期重玄学是继承了魏晋玄学的思想、并吸取了印度佛教发展起来的,而它的建立则是通过对《老子》、《庄子》的注释实现的。唐初重玄学与魏晋玄学相比,它把道家本体论发展为道家心性论,而重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成玄英和李荣都是道教徒,而且以后大多数通过注释《老子》、《庄子》来发挥其思想的大都也是道教徒。这就是说,到隋唐以后,从哲学理论上,前此的道家思想是由其后的道教接着向前推进的。但道教作为一种宗教,它必有一超越的终极目标以及如何通过修持达到这一目标的方法。重玄学虽然为此目标建立了以“理”、“性”、“心”、“气”的心性学架构,但它还没有提出一套为实现此目标的修持方法,其后有“内丹心性学”的出现。“内丹心性学”虽是唐末以后一直到宋明道教思想发展的特有形式,但从理论上,它仍然是道家思想宗教化的发展。就这个意义上说,道教的思想理论是和

道家的思想理论分不开的。我们编辑这套“道家文化研究丛书”就是基于这种考虑,把道家和道教联系在一起,都作为我们研究的对象。

这套“道家文化研究丛书”要求以专著的形式撰写,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撰写和出版能提高道家和道教的研究水平。为此,我们组织了全国各地对道家和道教有较高研究水平的四十余位专家学者作为这套书的作者,计划在三至五年内出版四十本有关道家和道教的专著,每年出版若干本。这四十本书大体分为四组:道家发展史专题研究,是按照历史时期对道家作思想史的研究;道家思想专题研究,是对道家思想所涉及的问题进行的研究;道教思想专题研究,是对道教所涉及的问题进行的研究;道家、道教著作专题研究,选择对道家和道教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典籍进行研究。虽然这四十本书每本都是单独的专著,但是把这四十本书作为一个整体看,则又可以看到道家和道教的方方面面。

这套“道家文化研究丛书”是由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和中国文化书院主持编写的,它能够出版,是得到了台湾凯胜集团董事长黄胜得先生的资助,又得到了上海文化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对此我们表示感谢。

汤一介

1999年7月8日

前 言

东汉末年,会稽上虞人魏伯阳(公元151—221年)所著《周易参同契》,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部奇书。

这部书以《周易》和道家思想为依托,广泛吸取先秦两汉天文历法、医学、易学、物候学、炼丹术等方面的成就,假借易学象数系统的结构框架,建构成以炼丹术为主体、天文历法为前提的天地人三才合一的庞大而又复杂的思想体系。尽管自该书问世以来,儒学一直占据着正统地位,但由于其文化内蕴的博大精深,以至一千八百余年来,说《契》注《契》者代不乏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层面产生过深远影响。

在天文学方面,该书以《道德经》的宇宙橐籥(风箱)结构模型与汉代兴起的宇宙鸡子结构模型相结合,提出乾坤坎离体用相须的宇宙牝牡四卦结构模型,成功地将宣夜说与浑天说融为一体,既无碍于历法的制定与推行,又生动地体现了宇宙间阴阳升降的动态平衡。

在化学、药理学、冶金技术方面,该书成功地描叙了铅的氧化还原反应、硫化汞的分解化合反应、铅汞齐的互化反应;该书所倡导的铅丹(即黄丹)与灵丹,是世界药物史上最早的人工制造的化学药品,李时珍《本草纲目》充分认定了这两种丹的药用价值。在冶金技术方面,该书对凡有汞参加反应的

炼制工艺,提出了严格要求;对参加反应的原料的分剂配伍,强调“以类辅自然”,杜绝任意添加非同类矿石的做法;在火候把握方面,该书以《周易》卦爻之象进行了多次描叙,表明作者对此的高度重视,所有这些都说明了我国在公元一世纪前后冶炼技术方面(特别是在铅汞齐炼制上)所具备的高超的工艺水准。

在调气养性方面,该书提出的“筑基”、“土游四季”、“两孔穴法”等,奠定了道教内丹术坚实的基石。在人体生命科学方面,为祛除疾病、延年益寿,提供了至今都难以超越的修炼方法,对中华民族的健康蕃衍作出过无与伦比的贡献。至于其在理论方面的价值,则将随着时代对其接受和理解程度的深化,逐渐成为引导人体生命科学发展的航标。

朱熹曾说,《周易参同契》,“词韵皆古,奥雅难通”。^①我们今天能够有幸地把握这部奇书的大致脉络,并非由于我们有什么过人的才能,而是完全得益于一代一代人对此书奥蕴的不懈追求。

从现存文献看,在外丹术盛行的唐代,《周易参同契》已被视为道教经典。唐刘知古《日月玄枢篇》云:“道之所秘者,莫若还丹;还丹可验者,莫若龙虎;龙虎之所自出者,莫若《参同契》焉。”^②该书在援引《参同契》时,往往谓“《经》曰”、“《经》不云乎”云云,可见当时将《参同契》视为道教经典,已是一种公认的现象。宋代以后,内丹术进入鼎盛时期,《参同契》在道教中的地位也随之被抬到顶峰。郑伯谦引高象先诗

① 朱熹《周易参同契考异》后跋。

② 《日月玄枢篇》,见明正统《道藏》《道枢》卷二十六。

云：“金碧龙虎参同契，留为万古丹中王。”^①阮登炳谓“《参同契》乃万古丹经之祖”，^②朱元育称《参同契》“实为丹经鼻祖，诸真命脉”。^③《周易参同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地位的日渐隆盛，首先是由道教练丹术由外丹转向内丹的重心转移所决定的，其次则与中国传统文化诸多层面全面融通的历史进程相关联。在北宋早期乃至中期，由于学术气氛比较宽松，道教文化开始为儒家正统学者所接受，如周敦颐的《太极图》、邵雍的《击壤集》、朱震的《汉上易传》，至南宋朱熹追溯源流而著《周易参同契考异》，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一时期全面融通的历史反映。

在《周易参同契》的流传过程中，由于该书所涵盖的知识面之宽广与其内蕴之精深，导致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仅仅只以某一个层面的光芒显现于世。在魏晋，注《契》者看重的是它的易学，故葛洪有“儒者不知神仙之事，多作阴阳注之”之说。^④在隋唐，注《契》者看重的是其中的外丹术，今存阴长生注本、容字号无名氏注本、彭晓注本是其证。宋元明清，注《契》者多重其中之内丹术，今存者如宋储华谷、陈显微，元俞琰、陈致虚、明徐渭、陆西星、李文烛、甄淑、张位、王文禄、清朱元育、董德宁、陶素耜、姜中真、尹太玄等人注本是其证。此外，古文派明杜一诚、王九灵、蒋一彪，清李光地、仇兆鳌、刘一明、刘吴龙等注本，也以重内丹著称。《参同契》并无外丹、内丹之称，后世为分别见，以《契》中之“炉火服食”为外丹，另称其中“引内养性”之说为内丹。《契》在不同时期以不同层面

① 见《抱一子解周易参同契》后叙。

② 《周易参同契发挥》阮登炳序。

③ 朱元育《参同契阐幽》自序。

④ 《云笈七籤》卷之一百九《神仙传·魏伯阳》。

取重于时,是就主导面而言,如隋代青霞子《读金碧龙虎经》云:“魏君三卷《参同契》,于中一一言真谛。子细说还丹,还丹事,不难制,何以似?黄白如鸡子。小小一事中,乾坤法象同。”又云:“造化手中权,身为壶里客。”^①前者言外丹,后者则言内丹。朱熹《周易参同契考异》认为《契》既言内丹亦言外丹,且往往因不明外丹之义,不得不缺疑以待来者。又,明彭好古《古本参同契》三卷,在版本上推崇古文本,而内容则内外兼重。主导面即主流面,故不排除其他层面少量兼杂的现象同时存在。

一部著作的知识涵盖面与精深内蕴,需要在相当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方能得以充分显现,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十分罕见的现象。就背景意义而言,这种现象的出现与时代精神的变迁以及占统治地位的学术思想形态的转换有密切关系;就《参同契》自身而言,其在天文、冶金、人体生命科学、医药学等方面所达到的成就,以及其融儒家、道家、阴阳家于一体的人文精神,使其文化价值远远超出了一般宗教所能覆盖的范围。此外,《参同契》以汉代易学的诸多条例建构的体系上的独特结构和语言表达方式,无疑给后代学者也增添了不少阅读和理解上的难度。至于简策淆乱以及文字错讹所带来的阅读上的困难自然也不小,但相对前者而言尚在其次。

将《参同契》作为一部历史文献进行考察和研究,是从现代才开始的。起初,这种研究与考察多表现在目录学或文献学的范围之内;继之,随着中国古代化学史研究的开展,研究工作开始进入《参同契》本身;再继之,随着气功热的兴起,

^① 据《诸真论还丹诀》引。

《参同契》的内丹术得到深入发掘。特别是近二十余年来,不少学者为此付出了巨大精力,为推动《参同契》的全面深入研究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这不仅表现在许多历史遗留问题被重新提出,而且一些从现时代视角观察所发现的问题也陆续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尤其令人喜悦的是,许多困难重重疑虑深深的问题都已达到了接近解决的边缘。

本书的写作能在这样的基础上展开,实在是笔者的幸运。然而所谓“接近解决的边缘”毕竟不是已经解决,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三点:其一,大多数研究者对汉代天文学成就缺乏了解,对汉代易学的发展状况、基本特征以及五行结构的静态配置和动作运作十分生疏,这种知识结构方面的局限,严重影响和制约了研究者对原文的理解。其二,史料发掘方面是已有成就中最突出的部分,但并未达到罄尽之境,因而在考据学上尚存不小的空间。其三,在史料分辨及研究方法上的失误,使有的研究者眼睁睁地从接近解决问题的边缘游离开去,或把本来简单的问题弄得复杂而不可解。

本书充分吸取了已有的研究成就,并通过深层的史料发掘,尽可能地使一切“接近解决边缘”的问题得到确解,并对以往研究者尚未问津而又不可回避的问题进行了全方位探索。本书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大致有以下七点:

第一,关于魏伯阳的身世。从汉桓帝熹平年间开始,直至汉献帝即位初期,后汉王朝接连发生了两次重大的政治斗争。其一是剿平梁冀之乱。淳于叔通从洛阳令退隐于会稽上虞,与此次政治动乱密切相关。其二是党锢之祸。此事发生在梁冀之乱以后,一批正直的士大夫为反对宦官专权,结果横遭迫害,时间前后牵延长达二十余年。上虞人魏朗,时为河内太



守，因反对宦官专权遭迫害致死，时人尊为八俊之一。从时间衔接上看，魏伯阳不可能早于魏朗，更不可能早于淳于叔通。上虞魏氏除魏朗更无高门，故魏伯阳只能是魏朗之子。又魏伯阳隐姓埋名入山修道的原因在于“委时去害”，显然与其父受党锢之祸而已身为躲避株连有关。又从魏伯阳《参同契》的学术渊源看，其儒学功力及对纬候的通晓与魏朗的著作《魏子》有关。又会稽人虞翻因与魏伯阳同郡，故能熟知魏朗事迹，且能最早得到《参同契》，并为之作注，其易学思想也深受《参同契》月相纳甲法之影响。这些都是了解魏伯阳身世不可忽略的史料。

第二，葛洪《神仙传·魏伯阳》不是伪书，其文字准确性最高的为《云笈七籤》本。该书所云“伯阳作《参同契》、《五相类》凡二卷”，真实反映了《周易参同契》在汉末至东晋时的基本面貌。今本《周易参同契》中五言句为《参同契》（这一结论，孟乃昌先生已得在我先），四言句为《五相类》，为魏伯阳后期所补作。五言句之作在先，四言言之作在后，这从前者之“纤微未备”与后者之“补塞遗脱”的文义比较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因此，四言句不可能是魏伯阳为五言句所作的传，而只能是他在著五言句若干年后又在此基础上撰著的一篇新作，并定其篇名为《五相类》。这个过程在四言句的后序中本来有明确交代，只是由于不少论者持“一个作者不可能批评自己以前著作”之说作为判断依据，硬将五言句与四言句定为出自两位作者之手。另外，以五言句主“九都丹”而四言句主“九鼎丹”，定此两篇之作者分属两个不同门派，这个判断也是不可靠的。“九都丹”与“九鼎丹”可以出自不同炼丹大师之手，但修丹者前修“九都”后修“九鼎”并非绝对不可能之

事,更何况后汉时期道教金丹修炼尚未形成门户森严的派系,《云笈七籤》中《神仙传》所载阴长生前炼黄白后修“九老仙都”之神丹事可以证明。

第三,《参同契》的简策错乱及篇章、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作者问题,是在该书传播过程中出现的。陶弘景《真诰》注引《易参同契》序,最早涉及淳于叔通师承徐真人,并未提到此二人与《参同契》有何种关系。在唐代,《契》已定成上、中、下三篇,与新旧《唐志》所录“《参同契》二卷”、“《五相类》一卷”同时流传。可见,唐代是《契》篇章结构变化的交接期,此交接期的完成大约在唐代中期,也就是说中期以后“《参同契》二卷”、“《五相类》一卷”之类的版式已经不复存在了。陶弘景所援引的《易参同契》注本亦与新旧《唐志》所载版式同样亡佚,而《真诰》注的有限《契》序引文尚存,于是引出了有关《契》的作者和传承的种种猜测。徐真人与淳于叔通因此而或者成为上、中、下三篇中某一篇文章的作者,或者成为魏伯阳之后前后相继的传人。明代所谓古文《参同契》以后,又有魏伯阳作经(四言句)、徐真人作传(五言句)、淳于叔通作《三相类》之说,这一讨论至今尚难以了结。综观古今的这一讨论,似有一细微处被人们忽略:这就是新旧《唐志》所录“《参同契》二卷”,比《神仙传·魏伯阳》多出一卷。这多出的一卷有可能是后来被编入下卷中的《大丹赋》和《鼎器歌》,时间当在东晋之后,即南北朝时期。陶弘景所见到的《易参同契》序所提到的徐真人、淳于叔通,则有可能分别与《鼎器歌》、《大丹赋》的撰写或流传有关。这虽然仍属推测,但陶氏所见之序既已不可复得,那么在所有的推测中当然以建立在篇章变迁上的考察更为接近事实。

第四,最早将浑天说与宣夜说融为一体,并通过乾坤坎离四卦建构一个宇宙结构模型,以坤内乾外象征天地之体,以坎离象征日月运行阴阳升降之用,生动地再现了宇宙的有限性与无限性的辩证统一,为更加精确的历法运算提供了理论准备。此外,与之相联系的一系列单相模型如坎离匡郭、四维时空、昼夜更迭、月相死生、十二月阴阳消长等,从不同侧面丰富了乾坤为体坎离为用的宇宙整体的细节,具有鲜明的形象性,再现了人类生存环境的整体性、有序性、动态性及其纵横交错的复杂联系。《参同契》中的天文历法大致反映了汉代的基本成就,由于《契》主修丹与天地造化同途,故若忽略了这一层面之研究,孤立论《契》中之“炉火服食”或“引内养性”,恐不足以尽其意。惜今之研究者多置此一层面于不顾,笔者不揣浅陋,试为论之,企盼得到中国天文学史研究专家的批评指导。

第五,利用五行数建构炼丹模型,是《参同契》区别于一般炼丹著作的独特之处。在汉代,利用五行数建构模型是一种相当流行的现象。如《黄帝内经》的五脏模型、《淮南子》的矿物衍生模型、《太玄》的太玄数、七篇大论(唐王冰补入《素问》)的运气模型等,都以五行数的方位图式置配各自相关的静态要素,然后在一定的条件下依据五行生克制化的机制推演其动态运作。在唐代,熟悉此术者越来越少,故现存的唐代以外丹注《契》的著作在这方面失误甚多。宋代以后,由于先天河洛图书之学的兴起,五行数方位图式明确被定名为“河图”,故宋代以后以内丹注《契》的著作在这方面大都比较准确。所谓《契》引用了“隐言密语”,实际上大都属于利用五行数建构的“炉火服食”与“引内养性”的模型语言。如果不了解这些模型语言的静态配置,便很难把握其动态运作的实际